

# 《秦妇吟》讳因考

张天健

晚唐诗人韦庄的名诗《秦妇吟》，《浣花集》、《全唐诗》都没有载。近代从敦煌窟中发掘九个《秦妇吟》写本，确证这部长篇叙事诗在唐末问世就名噪一时。可是后来湮沦诗海，寂寞无闻，惟五代词人孙光宪的《北梦琐言》卷六中稍见端倪。著名学者王国维、陈寅恪经过研究考证，对《北梦琐言》中有关《秦妇吟》的介绍提出了异议。但是，笔者认为，王、陈两位学者的研究考证，仍有阙疑，值得商榷。

孙光宪云：“蜀相韦庄应举时，遇黄巢犯阙，著《秦妇吟》一篇。内一联云：‘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尽公卿骨。’尔后公卿亦多垂讶。庄乃讳之，时人号《秦妇吟》秀才。他日撰家戒，内不许垂《秦妇吟》障子，以此止谤，亦未及也。”（《北梦琐言·卷六》）

《北梦琐言》的记载是清楚的。但留下一个存疑的问题：“他日撰家戒”，“他日”是指何时呢？“讳”是由于何因呢？

王国维跋云：“此诗前后残缺，无篇题及撰人姓名，亦英伦博物馆所藏，狩野博士所录……庄复贵后，讳言此诗，故弟蕙编《浣花集》不以入集，遂不传于世。然此诗当时制为障子，则风行一时可知，伯希和教授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书目亦有《秦妇吟》，下署：右补阙韦庄。彼本有前题，殆较此为完善欤？”（《观堂集林·题唐写本韦庄〈秦妇吟〉残诗跋》）

王国维指出了“庄复贵后，讳言此诗”，当然，既已讳言，才会撰家戒。他明确地指示了时间：即“他日”指的是“复贵后”。

陈寅恪又备细论证。他据《旧唐书·高骈传》唐僖宗责高骈之诏，认为：

“骈表中‘园陵开毁，宗庙焚烧’之语，当时朝廷诏书尚不以此为讳，更何有于民间乐府所言之锦绣成灰，公卿暴骨乎。……即此二句果有所甚忌讳，则删去之或改易之可也，何至并其全篇而焚绝之。……可知其忌讳所在，有关全篇之结构……不仅系于此二句也。依秦妇所述，此妇之出长安约在中和二年二月黄巢反攻长安城之后，……《秦妇吟》之秦妇，无论其是否为端己本身之假托，抑或实有其人，所经行之路线则非有二。《旧唐书·杨复光传》，王重荣为东面招讨使，复光以兵会之。又据两唐书王重荣传，复光与重荣合攻李祥于华州，及重荣军华阴，复光军渭北，犄角败巢军。是从长安东出奔洛阳者，自须经杨军防地。据旧书杨复光传，复光斩秦宗权将王叔，并其军，分为八部，鹿晏弘、晋晖、李师泰、王建、韩建等，皆八都，之大将也。是杨军八都大将之中，前蜀创业垂统之君，端己北面亲事之主，王建即是其一。其余若晋晖、李师泰之徒，皆当日杨军八部之旧将，后来王蜀开国之元勋也。当复光会兵华渭之日，疑不能不有如秦妇避难之人，及北梦琐言九所记西班牙李将军女委身之事。端己之诗流行一世，本写故国离乱之惨状，适触新朝宫闱之隐情。所以讳莫如深，志希免祸……而竟垂戒子孙，禁其流传者，其故倪在斯欤？倪在斯欤？（《读〈秦妇吟〉》）

首先，两家之说尚有阙疑。王说：“庄复贵后，讳言此诗”，但为了什么讳言却没有说清；陈说：“适触新朝宫闱之隐情，”“志希免祸，”并引《北梦琐言·卷九》李

将军女委身之事为证，这也不翔实。因为李女离乱奔蜀，是晦门阀。自以身托，托者为董司马，全然与黄巢义军无关，与秦妇所述也并无隐喻或附会之处，这又何能谈到触及宫闱隐情呢？

王、陈两说的主旨，分别认为撰家戒，讳言《秦妇吟》：一，时间是在韦庄复贵之后；二，怕触及前蜀新朝宫闱隐情，惧罹灾祸之故。当然，依此就否定了《北梦琐言》所语，“讳”是由于“内库”“天街”之说。尽管两位前辈学者对该诗研究有许多贡献，我仍以为并不能依此就否定了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所述。

王、陈两说论证的“讳”是针对帝王，自然就导出“志希免祸，”以至其弟韦蔼编《浣花集》不入此诗。我们先假定依两说，便可作如下推论：

先以“复贵讳之”来看，韦庄复贵是在终身仕蜀之时。经著名学者夏承焘考订“中和三月癸卯”作《秦妇吟》，时年四十八岁，到昭宗乾宁元年甲寅，韦庄第进士为校书郎，五十九岁，复贵当指仕蜀之时，为西蜀掌书记，系昭宗天复元年辛酉，六十六岁。那么，复贵距《秦妇吟》问世相隔几二十年。这个“他日”若指复贵后才垂戒子孙，那么此前近二十年中，该诗一定尚在流传，要禁止“适触宫闱隐情”的王建等人得之就不可能。给子孙垂戒的意义就不大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们也可以有理由再作如下推论，既然韦庄决意仕蜀，又怕《秦妇吟》触及宫闱隐情，志希免祸，但象这样家家制为障子，称誉为“秦妇吟秀才”的诗和人，即令时日旷久，也不是撰家戒就保了险，就可以放心仕新朝得免灾祸的。既如此，他入仕西蜀王建，岂非自投罗网？

这里，据杨湜《古今词话》载：“庄有宠人，姿质艳丽，兼善词翰。建闻之，托以教内人为词，强夺去，庄追念怏怏，作《荷叶杯》、《小重山》词，情意凄怨，人相传播，

盛行于时。姬后闻之，遂不食而卒。”此事《十国春秋·韦庄传》亦有记载，两说大体相似。

兹录《小重山》词：

一闭昭阳春又春，夜寒宫漏水，梦君恩，卧思陈事暗消魂。罗衣湿，红袖有啼痕。歌吹隔重阁。绕庭芳草绿，倚长门。万般惆怅向谁论？凝情立，宫殿欲黄昏。

显然，从词意看，这是韦庄代其宠姬抒写，疑情可谓深婉。春又春，言被夺后非止一年了。梦君恩，言旧日韦庄的恩情深厚。以下因梦而细思前事，以至失声流泪霜湿衣襟。歌吹一句，引出下阕，明言别殿正当作乐，而自己则独倚长门，满腹愁思，无人可语，只有一片愁情对黄昏。细观全词，实则暗写汉陈皇后退居长门故事。按《古今词话》之意，当为托言寄意。所以，宠姬能通文翰，深解词意，竟以殉情不食而逝。象这样大胆触及新朝宫闱隐情的词，象“歌吹隔重阁”“万般惆怅向谁论”，这样有露骨幽怨的诗句，韦庄都不避讳，何以独独怕《秦妇吟》犯忌呢？据此，也可以别证《秦妇吟》讳因并非出于“复贵讳言，”怕触新朝隐情了。

又如《北梦琐言》逸文卷二记载有关王建的事，曾说：“……识者以建能戒能惜，不陷人于刑，仁恕之比也。”以王建的为人尚好，能戒能惜，韦庄又何必复贵而讳？这也可以说明，《秦妇吟》一诗，不应当定为是“复贵讳言”和“志希免祸”而撰家戒的。

其次，至于王国维关于韦蔼《浣花集》不收《秦妇吟》为复贵讳言之说，其对《浣花集序》的理解，颇有可商榷处。姑引录如次：

“家兄自庚子乱离前，凡著歌诗文章数十通，属兵火迭兴，简编俱坠，惟余口诵者，所存无几。尔后流寓飘泛，寓目缘情，迄于癸亥岁，仅千余着。辛酉春应聘为蜀记。明年于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，结茆为屋，思其人，欲成其处，蔼因录兄稿，或默诵者，次为十卷，目之

为《浣花集》。

这很明显，序言里有两个地方值得斟酌：一，“仅千余首，”“仅”是表范围狭小的副词，说明尚有大量诗作在编外。即以《浣花集》来谈，原本二十卷（《十国春秋》），今存十卷，共有诗二百四十首，连后人所辑，不过四百首。比起千首来也未及半；二，自庚子乱离迄于癸亥，二十年，时间不可谓不长。照韦蔼说“因录兄稿，或默诵者，”那么，有的诗是靠回忆编录的。而象《秦妇吟》这样鸿篇巨制罕见的长诗，加上年代久远，颠倒混乱或遗忘就可能是意料中事。这也可能是《浣花集》不载的原因之一。

综上所述，韦庄又何以“讳”之而“撰家戒”呢？其实，《北梦琐言》后面一句十分重要：“以此止谤，”“讳”因是止谤；谁“谤”呢？前面说：“尔后公卿亦多垂讶，”“讳”的对象已非常清楚，当是指的“公卿。”考《秦妇吟》诗，最为有力的证据，还是《秦妇吟》本诗。这里且录《秦妇吟》一节如下：

是时西面官军入，拟向潼关为警急。  
皆言博野自相持，尽道贼军来未及。  
须臾主父乘奔至，下马入门痴似醉。

写出了官军在黄巢义军兵锋之下，望风退避，土崩瓦解。只顾回军报急。人们都谈及兵力足可相持，可他们托言的理由是猝然不及。这分明是自己原谅的遁词。而新旧两唐书均载潼关之战，田令孜疏忘禁谷，失守潼关，载长安禁军服鲜纛，不知战阵，甚至雇佣负贩屠沽代战。官军大溃之后，他们乘奔慌乱，呆痴如醉。如果说它仅揭露了公卿的惶惧，那么再看诗的后半：

一从狂寇陷中国，天地晦冥风雨黑。  
案前神水咒不成，壁上阴兵驱不得。  
闲日徒歆奠响恩，危时不助神通力。  
我今愧慙拙为神，且向山中深避匿。  
环中箫鼓不曾闻，筵上牺牲无处觅。

旋教戾鬼傍乡村，诛剥生灵过朝夕。

这分明是以神为借喻，更进一步揭露了公卿。《旧唐书·高骈传》载高骈于败军之后，表奏僖宗“臣散征诸道兵甲，尽出家财赏给，而诸道多不发兵，财物即为己有，纵然遣使征得敕旨不许过淮。其时黄巢残凶，才及二万，经过数千里，军镇尽若无人，只如潼关以东，止有一径，其为险固，甚于井陘，岂有狂寇奔冲，略无阻碍，即百二之地，固是虚言，神策六军，此时安在？”所以，诗人对“闲日徒歆奠响恩，危时不助神通力”的神们，简直是直言愤怒。紧接着，诗人下面写道：“陕州主帅忠且贞，不动干戈惟守城。蒲州主帅能戢兵，千里晏然无戈声。”有抑有扬，褒贬分明，诗人是有意在对比中深深鞭笞尸位素餐的公卿们了。

这里，神的借喻只是虚写，它又和后面的叙事实写相应，形成虚实相通。何以知之？且看通过新安途中乞浆一翁的述词：

千间仓兮万丝箱，黄巢过后犹残半。  
自从洛下屯师旅，日夜巡兵入村坞。  
匣中秋水拔青蛇，旗上高风吹白虎。  
入门下马若旋风，罄室倾囊如卷土。

这就更进一步道出了官军们的昭昭恶迹，对洛下师旅直面指陈。诗人对此愤慨良深，因之在另一首《虎迹》诗中，仍用借喻手法虚写此事：“白额频频夜到门，水边踪迹渐成群。我今避世栖岩穴，岩穴如何又见君。”韦庄以或实或虚的手法，穷形尽相写出了公卿们怯懦而苟全性命的情状。这些平日靠高爵厚禄供养实指望为皇朝全忠殉节的公卿们，就是这副模样。蓄养的官军呢？不见抵抗，窜避乡村，他们对黎元凶相毕露，见义军鼠窜逃亡，凶悍而怯懦的二重性，诛剥生灵之状可谓令人发指。

黄巢义军是庚子（八八〇年）十二月攻入长安，次年，诗人在来不及写出长篇巨制之前，在另一首诗中就写道：“但有羸兵填渭水，更无奇士出商山”（《辛丑岁》）。所

以，“内库成灰”“天街暴骨”，他们的罪责能原有吗？诗人主观上是站在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立场上，写黄巢之乱，客观上却描述了义军石破天惊的威势，也暴露了“公卿们”猥琐的灵魂。上述《秦妇吟》诗中言潼关官兵土崩瓦解之状已够证明。这里再引几条资料如下：

据《通鉴·唐僖宗纪》载，东都陷后：

“己亥，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。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，赂宦官窜名军籍，厚得廩赐，但华衣怒马，凭势使气，未尝更战阵，闻当出征，父子聚泣，多以金帛雇贫人代行，往往不能操兵。”

“丁丑，承范等至华州，会刺史裴虔余徙宣歙观察使，军民皆逃入华山，城中索然，州库唯尘埃鼠迹。”

潼关之战更记叙有以下事实：

“贼之攻潼关也，朝廷以前京兆尹萧瑒为东道转运粮料使，瑒称疾，请休官，贬贺州司户。黄巢入华州，留其将乔铃守之。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于贼。”

“甲申，以翰林学士承旨，尚书左丞王徽为户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以卢携为太子宾客，分司。田令孜闻黄巢已入关，恐天子责己，乃归罪于携而贬之，荐徽、澈为相，是夕，携饮药死。”

《北梦琐言·卷十四》又载事实如下：

“王铎初镇荆南，黄巢入寇，望风而遁。他日

将兵捍潼关，黄巢令人传语云：‘相公儒生，且非我敌，无污我锋刃，自取灭亡也’。”

这些足证公卿们的表现是很差劲的。此外，唐僖宗乾符四年曾有诏令：“如逢寇不追，临阵不战，贪黷逗挠，败失师徒，宜令本州道勘寻，准军法处分”（《唐大诏令集讨草贼诏》）。乱平后，从僖宗光启元年还京，黄巢失势被杀的时间（八八五年）看，象担任汝、洛、晋、绛、同、华都统，将左右军东讨的田令孜，仍有恐天子责己而迁罪于卢携的暗算，苟全性命的公卿慑于时议，安得不“垂讶？”又安得不“谤？”这样，韦庄的忧谗畏讥也很自然。其时，距《秦妇吟》的写成（八八三年）不过两年时间，正是长诗不脛而走，家吟户诵之时。所以，《北梦琐言》才有“止谤”，而末句出以“亦无及也。”正因为是问世不久的盛传期。

《北梦琐言》的记载是颇为翔实可信的。

由此可见，韦庄为《秦妇吟》撰家戒，“他日，”应当是在光启元年僖宗还京之日，并非时隔二十年的“复贵”之时；“讳因”并非针对王蜀而为的“志希免祸”，而是针对“公卿垂讶”“谤议横生。”这与前辈学者的研究是稍有牴牾的。同时，也证明五代孙光宪的《北梦琐言》讳避之说是可信的。不揣愚妄，仅作为蠡测之见，引玉之砖，就正于学者专家。